

曾国藩全书

曾国藩

百年家世



远方出版社



曾国藩全书

主编 梁 勤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阿荣

曾国藩全书

主编：梁 勤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大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216.5 字数：510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ISBN 7 - 80595 - 769 - X/K·27

定价：748.00 元（全 25 册）

目 录

第一章 薪火传人曾氏后裔	(4)
一、曾国藩长子曾纪泽	(4)
二、曾国藩次子曾纪鸿	(11)
三、曾国藩长女曾纪静	(15)
四、曾国藩次女曾纪耀	(18)
五、曾国藩三女曾纪琛	(21)
六、曾国藩四女曾纪纯	(24)
七、曾国藩满女曾纪芬	(26)
八、曾国藩长孙曾广钧	(31)
九、曾纪泽长子曾广铨	(35)
十、基督教徒曾广钟	(37)
十一、爱国化学家曾广铨	(40)
十二、曾国藩孙女婿吴永	(42)
十三、对西方文化情有独钟的曾宝荪	(47)
十四、著名教育家曾约农	(56)
十五、著名考古学家曾昭燏	(63)
十六、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	(66)
第二章 沧桑百载	(72)
一、话说曾氏	(72)
二、竿头百尺后人强	(82)
三、持俭戒奢曾纪芬	(91)
四、曾国藩孙辈纪略	(97)
五、指腹为婚婚后事	(103)
六、家风继世长	(107)

第三章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	(112)
一、来电惊宫	(112)
二、出使俄罗斯	(128)
三、谈判之前	(135)
四、智斗俄记者	(142)
五、挺身搭救女画家	(152)
六、接 印	(165)
七、面对强手	(173)
八、雪上加霜	(184)
九、两手准备	(196)
十、再度周旋	(202)
十一、谈判摊牌	(207)
十二、夜梦先太傅	(213)
十三、谈判记录	(224)
十四、心忧变革	(231)
十五、痛斥法外史	(243)
十六、不屑诬陷	(249)
十七、抱病赴谈	(261)
十八、不卑不亢	(272)
十九、会谈成功	(295)
尾 声	(300)

曾国藩家世百年

卷首语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迎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以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上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曾国藩

前言

乱世出英雄，时世造英雄。自然也因了“英雄”的努力奋斗，曾国藩家族被御封为“大清第一世家”。

世家，世代相传，皇帝给名给利，古人称荫及子孙。但谁都知道，除非皇帝的江山永固，否则，即唇亡齿寒。

永固的江山从来都没有，曾国藩死后40年，辛亥革命便给满清王朝画上了最后一个封建帝国的句号。曾氏家族也未能享受皇恩浩荡多久，虽然隆重，终于逐渐地衰落下来。

曾氏后人在战争的动乱中惶惶不可终日，颠沛流离于武汉、上海、台湾，土改时斗地主分田地自然不能幸免。正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老话。甚至还不到五世，便兵连祸接，家国两茫然了。

曾氏的后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祖上出了曾国藩，曾国藩是一位近代史上举足轻重不可多得的历史人物。曾国藩留下了足以警励后代的著名家书。曾氏祖训：可以不做官，不可以不读书。曾氏的后人多为孝子贤孙，而且牢牢记取祖训，付诸实践。

外交家、数学家、教育家、行政官员，颇有些群星灿烂的光彩。但终于没有成为百年望族。这不是家之悲哀，而是国之悲哀。

事实上，历史的百年望族屈指可数，良好的遗传基因和家庭教育仅为内因，关键是需要外因——外部环境的保护。盛世百年才有盛世旺族。一旦战乱，覆巢之下，安得完卵？

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太阳

不会停留在一个门口。“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胜者王侯败者贼。“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江山更替寻常事。

所以，长盛不衰，长治久安的气象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追求完美，却始终是人类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否则，社会就停滞不前了。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读懂了曾氏家族。

曾氏家风，是中国家庭的楷模。

第一章 薪火传人曾氏后裔

一、曾国藩长子曾纪泽

曾纪泽（1839—1890年），系曾国藩长子。他出生在宦宦之家，却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学识人品俱佳。他在降临人世之时，其父曾国藩已在京城做官。后来曾国藩拜相封侯，叔父曾国荃也官至两江总督等，可以说他出生在一个正宗的宦宦世家。然而，他并未沾染世家子弟的习气，这与其父曾国藩对他从小就进行严格的家教有关。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而他寒窗苦读数十年，从军十数载，备受艰辛，深知名誉、地位、家业的确来之不易，因而渴望自己的儿孙显赫万世，永不衰败。但是，他目睹那些达官显宦家庭的子女，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困守祖辈留下的基业，就是挥霍浪用，吃喝嫖赌，欺压下民，横行市井，不思上进，家业荡然无存的诸多事例，而为此深深忧虑不安。于是，曾国藩冷静思索，费尽心机，从封建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独创一套治家理论和方法。从曾国藩家书、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温言细语，言传身教，谆谆诱导曾纪泽等人好好读书，好好做人，不求做官发财，不以优越地位自居，重在真才实学，自立自强。

在读书方面，为什么要读书，怎样读书等问题，曾纪泽自幼

起就受到曾国藩反复训导。关于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曾国藩认为除了生存所需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然而，要改变气质，就必须“先立坚卓之志”。他告诫曾纪泽说：“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曾国藩在这里明确告诉曾纪泽，读书的好处多得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改变人的气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立志。人生就是那么几十个春秋，从小不立志读书，不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老大就会后悔莫及。他一再嘱咐曾纪泽：“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应当珍惜这优越的家庭环境和条件，趁年轻的时候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关于如何读书的方式方法问题，曾纪泽受到曾国藩的指导特多。检诸曾国藩家书可见，曾氏对曾纪泽兄弟在这方面予以了细致而又亲切的训导。诸如怎样读经典书籍，怎样读制艺文字，都有区别对待。1858年8月，曾国藩在《谕纪泽》一信中具体概括了读书的四种方法：“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紧接着，他以实际事例就这几个字作了解释：“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读者，如《四书》、《诗文》、《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对于这些书，“非高声朗诵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他把“看”与“读”这两者各自好处特点作了生动的比较：看书就像在外面经商贸易，获得的利润是原来的几倍；读书就像在家里谨慎守业，不轻易花费钱财。又好比军事家用兵打仗，看书就像攻城夺地，扩大自己的领土地盘；读书就像挖沟修垒，夺得了土地就要能够坚守。至于写，主要是如何写好字的问题，“切不可间断一日”。至于作，主要是指作诗文，他叮嘱曾纪泽必须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诸如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诗，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

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过了 30 岁以后，“则长进极难”。曾纪泽资质中等，但在父亲的循循诱导之下，异常刻苦认真，打下了牢固的国学根底。他所做的诗文虽然没有曾国藩那样雄伟瑰丽、气势宏大，但也显得章法严谨，笔法老成。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曾纪泽后来成为一个新派人物，与曾国藩对他的指教也有很大关系。1858 年 9 月，在曾国藩快 50 岁的时候，他总结了自己大半辈子的学问后，对曾纪泽讲了他平生有三耻，并语气深切地嘱咐曾纪泽“当思雪此三耻”。其中之一是“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他叮嘱曾纪泽先将家中有关科技方面的书籍，如《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在曾国藩的教导之下，曾纪泽自 20 岁起，在学习其他知识的同时下苦功涉猎西学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如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他都用心钻研过，并能著文介绍推广。在《几何原本序》一文中，曾纪泽指出：“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学者泯其迹而求之，往往毕生习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视为绝学者。无他，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因此，他要推介《几何原本》的好处，使国人了解西方数学的效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致其知于此，而验其用于彼，其如肆力小学而收效于群籍者欤？”在《西学述略序》中，曾纪泽首先肯定：“其向学易而为学有次第，此奉西学者之所以众多，学而成名亦因是而济济焉。”紧接着，他指出西方光色之学等，“推测之眇，通乎神明，其学亦无穷极焉”。他高度赞扬由赫德选择、艾约瑟译成中文的 16 种西学科技著作，“虽曰发蒙之书，浅近易知，究其所谓深远者，第于精微条目益加详尽焉耳，实未始出此书所纪范围之外，举浅近而深远寓焉，詎非涉海之帆楫，烛暗之灯炬欤！”与此同时，曾纪泽靠自学，能用英语

交谈，以英文写作和核改外交文件，这在当时士大夫鄙夷西学、保守气氛浓厚的文化环境下，是很不容易的。曾纪泽弥补了其父在这方面的不足，洗雪了三耻中的一耻。

在如何做人方面，曾纪泽受曾国藩的教诲也很多。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子孙寄予的最大希望是：“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君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就是“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他告诫曾纪泽：“宜举止端在，言不妄发”。如果能做到这样，就是“入德之基”。同时，从小时候起就应当养成一种不贪爱奢华，不习于懒怠，这对于官宦人家的子弟来说，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翻阅曾国藩家书，诸如教训子孙做人的文字数不胜数，体现了曾国藩殷切希望曾纪泽兄弟自立作好人的一片良苦用心。他在1870年赴天津查办教案之前，特预立遗嘱谕二子，“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在曾国藩悉心家教之下，曾纪泽为人厚重，处事精明果断，而且学识渊博，中西贯通，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受到时人的称赞。

1870年春，曾纪泽由二品荫生奉旨赴京引见，升户部员外郎。1877年父忧服除，袭封毅勇侯爵。1878年出任驻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次年转大理寺少卿。在此期间，巴西国通过英公使与曾纪泽联系，谋求与中国通商，他审时度势，奏请清廷与之建交通商，开启了中巴建交的先声。1880年，使俄大臣崇厚昏庸无能，因与沙俄擅订《里瓦几亚条约》，被革职定罪，清廷根据曾纪泽的外交才能，又任命他兼充驻俄大臣，与沙俄谈判改约。在此之前的1871年7月，沙俄为了与英国争夺我国新疆，在所谓“保卫俄国边境”的借口下，派兵强占了伊犁。1878年6月，左宗棠率兵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而崇厚所订《里瓦几亚条约》虽然使伊犁在名义上归还中国，但其西、南两

境均被沙俄割占，处于“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境地，随时都有被沙俄重新掠取的危险。消息传出之后，朝野沸腾，群情激愤，坚决要求清政府“先折之以议论”，“次决之以战陈”，用外交和军事配合的手段收复新疆全境。曾纪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兼任驻俄大臣的。然而，与俄国人谈判，索回已投之食，确非易事。曾纪泽考虑到：“俄人桀骜狙诈，无端尚且生风，今于已定之约忽云翻异，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圜之路，中国人设身处地，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然而，他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决心“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争回国土，维护主权。

1880年7月，曾纪泽赴彼得堡进行谈判。他的对手是极为狡诈的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外交部顾问热梅尼以及驻华公使布策。8月4日，曾纪泽初赴沙俄外交部，商谈递交国书的日期，但吉尔斯宣称“现在只候照行，无可商改”，拒绝谈判。曾纪泽以“凡各国订约，必俟两国批准方能施行，如所订之约难行之处，例可再议”，顶回了吉尔斯的谬论。在谈判期间，沙俄代表妄图以战争相威胁，并要求曾纪泽作出永远不索还伊犁的保证。曾纪泽针锋相对，此次谈判的目的就是为了索还伊犁，至于打仗，胜负难知，倘若中国获胜，俄国亦须赔我兵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谈判，终于1881年2月初议定新约。据曾纪泽在给清政府的电文中汇报说：“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就原约所失利权“挽回之端已十得七八”。是年2月底，中俄双方正式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又称《彼得堡条约》。该约虽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与《里瓦几亚条约》相比较，除增加赔款数目之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都为中国争回了一部分主权。这是曾纪泽从“替国家保全大局”出发，在复杂尖锐的外交斗争中从容应付，据理力争的结果。

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作为抵抗派中突出的一员，主要做了

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阐发他的抗法主张，批驳了妥协退让的论调；二是利用合法身份，与法国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外交谈判。

曾纪泽极力主张抗法的理由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法图越南，志在侵我西南利权。当时，清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不值得为一个“藩属”的问题去得罪西方强国。曾纪泽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越南危，非中国之福”。自19世纪70年代法国占据越南西贡等地后，起初以为从澜沧江、湄公河可直通中国境内，后因该两处水浅且湍，多处不能通航“遂欲占据越南东京，由富良江入口以通云南”。为什么法国对越南的据点一再改换，而又急欲通航中国呢？曾纪泽深刻指出，这是因为“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可见，法之侵越，目的非常明显。中国决不能袖手旁观，任其为之。他极力主张，应乘“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日增”的大好时机，“齐心协力”，奋发自卫。

其次，法国处境困难，内外矛盾重重，力量并不雄厚。曾纪泽在细心考察分析了法国实情之后指出，法人内慑于德，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它国内“朋党相竞，政出多门”，步调并不一致。即使暂时爆发战争，法国也很难坚持到底。这是因为，法国离越南数万里之遥，“筹兵、筹饷，尤非易易”。只要中国军民实力备战。坚决抗击，法国一定不能坚持过久。法国之所以在中法正式开战之前急欲议和，其诡谋在于：“先张声势，……犹是恫吓以尝我耳。”他提醒李鸿章等人，不要被法国的假相所迷惑，不要为它的威吓恫吓所屈服，应当振作精神，采取实力备战的主动措施。

再次，中国有能力抵御法国，且有取胜的希望。曾纪泽在分析了法国的情况之后，又对中国本身的实力作了考察：“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使敌人有所顾忌，或

可不至于剥肤噬脐之悔。”因此，只有实力备战，主动出击，才能“使敌人有所顾忌”。“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总之，今日除抗战以外，别无他途，“中外强弱之机，在此一举”，只要坚持抗战到底，中国就有取胜的可能，并将由弱转强。他警告清廷，再也不要举棋不定，三心二意而失去良机了。

然而，清政府无视曾纪泽的抗法主张，斥之“多为愤激之谈”，“似是臆度之词”。从而，不作抗战准备，一味姑息退让，急于和谈了事，终于使得中国步步坐失良机。曾纪泽“终日焦灼，百事颓废”，愤激异常。他坚持定见，一面继续与法国政府反复争辩，不稍苟让。一面扩大影响，争取国际同情：“惟向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清政府惟恐战火延至中国内地，即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侵略者加速和谈，从而增长了敌人的气焰，使得曾纪泽与法国政府的谈判更加艰难。在多次谈判过程中，法人肆加凌辱，横蛮不讲理，致使曾纪泽旧疾复发，“每晨起辄咯血数口，血虽不多，颇形委顿”。但他置之度外，将个人安危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考虑到“辱身即以辱国，且忍辱往晤，仍不见答，是于公事无益，徒示弱耳。公使示弱，则敌情益骄”，仍据理力争。然而，尽管曾纪泽“不见礼于法庭，则依然如故”，终究挽回不了中国失败的结局。1884年4月，李鸿章奉清廷之命与法国正式签了《停战协定》，前线官兵纷纷撤回。曾纪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悲愤难言。他痛陈中国战败的原因，“实由吾华示弱太甚，酝酿而成”；浩叹议和已成，“岂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让即了也，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他指责李鸿章所订条约，真可谓“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字里行间，无不透露他一片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

曾纪泽虽然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但不同于当时一般士大夫，只知固守着“夷夏之辨”的老皇历，仍然津津乐道什么“中国地大物博，礼仪之维，为四海万国所宗仰”的传统观点。他能注意观察社会，正视现实，浩叹中国积弱致贫，深受列强侵掠之害，形成了一种“亘古未有之奇局”。指出这种后果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道者昧于洋情，不了解西方实情所致。因此，他从爱国民族立场出发，热心观察、学习西方。当他在出使期间，较多地接触和了解到西方社会实情之后，对其“富强之有本，艳羨之极”。尤其是当他对欧美诸国科学技术实地领略之后，更是赞不绝口：“鬼斧神工，真可怪诧！”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之上，曾纪泽认为，如再“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后患无穷，极力主张吸取西方有用的东西。他对顽固派昏睡于“天朝上国”、“世界第一”的梦幻之中，百般阻挠、攻击“事夷”，视西方世界为“异端邪说”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并指出：“吾华清流士大夫，高论唐、虞、商、周糟粕之遗，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独无益，实足贻误事机，挫壮健之躯，以成羸尪之疾”。与此同时，曾纪泽认为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对洋人一味迁就，原因就在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西方。缺乏应有的民族自尊心。总之，曾纪泽感到，对待洋人，“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实事求是”。

总之，曾纪泽的洋务观是在他出使期间较多比较中西方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的基础上产生、形成起来的，在这一思想观念的指导之下，他的外交言行焕发出爱国民族意识，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位杰出的爱国外交家。

二、曾国藩次子曾纪鸿

曾纪鸿（1848—1881年）系曾国藩的次子。他自幼聪明过

人，悟性特好，本可朝着科举考试这条道路拼搏下去，但在他 8 岁的时候，其父曾国藩在给诸弟的信中嘱咐说：“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1858 年 9 月，也就是曾纪鸿满了 10 岁的时候，曾国藩又告诫曾纪泽必须注意科学技术方面的学问，希望他们兄弟俩将来能够洗雪他感到遗憾的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埃，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尔若为吾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自此之后，曾纪鸿在攻读举业的同时，致力钻研算数之学。由于曾国藩在倡导洋务运动期间汇集了全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如华蘅芳、李善兰、徐寿、徐建寅等人在自己的周围，并聘请外国人与中国科学家合作翻译了《化学鉴原》、《物体遇热改易说》、《汽车发轫》、《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决疑数学》等书，所以曾纪鸿得以有机会结识到这些科学家，以及他们有关介绍西方科技的著作，从而对近代科技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而对科举之业相对来说有所放松，故几次进京应试均名落孙山。据曾昭棉所撰《曾栗诚公年谱》记载：“清同治七年即 1868 年曾纪泽 20 岁时居住于两江总督署，曾国藩在督促他们兄弟读中国书籍的同时，又要他们兄弟“写《律吕表》，命公代算”。自 1858 年起，曾纪鸿“即喜习算学不辍，此时已能应用矣。”1872 年下半年，办完其父丧事之后，曾纪鸿居住于长沙，与算学爱好者丁取忠等人相互切磋算数之学，同时还与外地数学爱好者书信往来，互相交换学术心得。从此时起，曾纪鸿就着手写作有关数学方面的著作。他的好朋友曾有意问他为何下这样的力气来专攻数学的问题，他回答说：“此夙志也。”经过几个月的艰苦研究，曾纪鸿写出了第一部学术专著《对数详解》，计 5 卷。是书对对数的源流，对数的原理以及实用价值等作了简明扼要的阐发。是书由丁取忠负责刊刻印行，后收入《白芙堂算学丛书》。曾纪鸿不仅学问渊博，而且人品极好。由于他所著《对数详解》一书受到同行的启发和支持，所以